

冷战国际史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 ——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李丹慧*

【内容提要】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而言，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关键词】中苏分裂 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 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105-(25)

19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欧五国，即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作为经互会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在政

*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治、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自主性相对薄弱，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与苏共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五国的对华政策突出地表现出配合苏联对华政策的特点。其间，五国的对华态度虽然时有差异，但其对苏共理论纲领的认同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则与苏联大唱对台戏，态度也比较僵硬而缺少变通。相应地，中国同东欧五国关系的演变实际上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起伏而波动。其大致走势是：1960—1964年，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展开大论战，两党关系破裂，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随之出现裂痕并呈现恶化的趋势；1965—1969年，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国另起炉灶，缔造世界革命的中心，中苏关系恶化乃至爆发边界武装冲突，两国同盟关系名存实亡，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严重恶化。

应该说，东欧五国与中国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就经贸关系而言，苏联固然是五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但他们对于对华贸易也有不同程度的依赖。例如波兰，对外贸易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40%的职工依靠外贸生活，所谓“对外贸易对于波兰‘就像人离不开空气’”，“没有贸易，波就不能生存”。中国则可以成为波兰工业产品的最大主顾，反华必然给波兰带来不利的经济后果。^①而保加利亚在东欧五国中经济力量最为薄弱，其对外贸的依赖也颇为显著。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两三年中，中保贸易降低了五分之四，给保的国民经济“造成损失”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东德和捷克，也都“不满意把自己的贸易局限在经互会范围之内”。^②因此，与中国团结、友好、合作最符合东欧五国的利益。19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时期，东欧五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发生与难以调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潜在的体制性弊病，即强调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以党际关系取代国家关系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1960年末，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通过共同文件《莫斯科声明》，特别重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为重塑苏共是国际共运的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由于东欧五国党的思想观点与苏共基本一致，以及经互会分工、专业化机制造成五国在经济上依赖苏联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五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国际路线斗争中，成为苏共依靠的核

① 参见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10月17日；王炳南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31日；我参加波兹南博览会政府代表团访波情况的报告，1965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109-02311-01；109-02392-01；109-02907-01。

②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8月4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2625-02；109-02747-01。

心力量。其间虽有苏联对东欧五国所谓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存在，但在整个 1960 年代，苏联对五国的制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中苏关系也自然成为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主导性因素。当 1960 年夏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后，东欧五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开始紧密配合苏共代表团，对中共代表团展开围攻。此后至 1960 年代末，在以中苏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共运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中苏关系的每一步变化几乎都直接影响着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使之呈现出时冷时暖、松紧交替的态势。

本文以中国解密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 1960 年代中苏关系因素对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处理同五国关系方针的变化情况，为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发展勾勒出一条逻辑线索。

中苏关系短暂缓和带来中国与东欧关系一度回暖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为了迫使中共屈服于苏共的理论纲领，赫鲁晓夫于 1960 年 7 月决定单方面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出分裂的趋势。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以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这种状况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①于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 24 字方针^②，其侧重点实际放在了“后发制人”和“留有余地”上面。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缓和为主的对苏让步方针。中国在处理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温和，就是落实此方针的结果。此后至是年末，中共在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达成妥协，签署《莫斯科声明》，以此为转折点，“缓和”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

进入 1961 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用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话说，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甚至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③毛泽东则在 1 月 18 日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 年 8 月 10 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37 页。

③ 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 年 1 月 5 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①彭真还形象地描述中苏不再争吵的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他还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②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后，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以及中国国内对这次大会通过的苏共新党纲的批判，使得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中国此时的注意力仍然放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中苏两党都表示要珍惜关系缓和的局面。1962年春季，苏联报刊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日的报道，“基调是强调中苏团结，相互支持，携手前进”；中共中央采取的还是“以缓和对缓和的方针”，认为“现在不是斗的时候”，“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押在这个宝上”，“同苏联的关系要保持到一定水平，争取好转”；强调“一定要继续努力加强……中苏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③不过，一直到1962年10月，中苏关系实际上逐步进入了一个僵持阶段，关系时紧时松、内冷外热。

此时，东欧五国同中国的关系与中苏关系的缓和同步，出现了回暖迹象，冷热交替。

在《莫斯科声明》发表之前，赫鲁晓夫曾专门与若干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兄弟党负责人谈话，部署“如果中共代表拒绝在声明上签字，大家就联合起来像狼一样地围攻中共代表”。哥穆尔卡则不仅在会前公开谴责中共，召开波党中央全会作出反华决议，向中共提交意见书，“自己开始写文章参与反华”，而且还在“在莫斯科会议上站到第一线充当打手反对”中共。但是，当刘少奇发表讲话说完全同意声明的内容，签署了该文件，中苏迎来新一轮团结友好的局面后，波党虽限制中国党在波兰影响的扩大，但在宣传上也开始增加对中国建设的报道。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特别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的友谊。1961年1月31日晚，萨瓦茨基设宴招待前来波兰参加报刊三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代表团及波新闻界活动家，并与波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奥哈布一起主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进行友好谈话。萨瓦茨基称赞波报纸上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通讯写得“很美很精辟”，把人民公社“作为正面的、好的现象加以描写”。奥哈布则表示，“我们要求波兰报刊，更多地报道中国”；“中国发展

①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

② 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③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并中联部电，1962年2月10日至4月6日；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1962年4月26日；陈毅在部党委会听了刘晓关于驻苏使馆工作汇报后所作的指示，1962年2月16日，外交部档案，109-03813-01；109-03811-02；109-03801-01。

迅速，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强国将来一定都能超过美国”。是年 10 月，波兰对中国国庆的庆祝比上一年隆重热烈，波党报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报道的限制有所放宽，而波地方上的庆祝会报告人则主动赞扬中国的“三面红旗”。波党通过这些举措，摆出了一种“亲苏拉华”，改善波中关系的姿态。^①

1960 年 11 月 25 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发表社论，纪念《莫斯科宣言》三周年，不再宣扬过去坚持的“无武器无战争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以及和平共处政策是保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等论点，特别是根本不提“教条主义”。同日，保鲁赛市人民委员会文化休息站向中国驻保使馆提出：12 月份准备以该市党委、人委、祖国阵线的名义举办保中友好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 10 月 1 日前后，保方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冷淡，曾破例取消了在索非亚等地为中国组织的国庆晚会，而时隔月余，值此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议上协商相互让步之际，一直站在与中共斗争前列的保方突然表示要在一个州辖市举行保中友好周，不能不说是破例了。^②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在缓和的旗帜下围绕阿尔巴尼亚问题展开明争暗斗，保加利亚的对华态度也一度很冷，到 1962 年 2 月，甚至发展到保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攻击性信函的地步。但是，随着苏中两党借纪念两国同盟条约签订之机同奏缓和之曲的节拍，保方的对华做法也出现了“松动迹象”。保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在 4 月 4 日匈牙利使馆举行的匈国庆招待会上对到会的中国大使表现出格外的友好，当中国等兄弟国家使节向其敬酒时，他在主动表示“今天，在这里有苏联、中国、波兰……的代表在一起喝酒，是体现兄弟国家间的团结友好，请大家干杯”时，特意把中国紧排在苏联之后。生怕中方人员听不懂，他还先后对着中国大使和中国翻译连续将此话重复了三遍，不仅用中国话说了“干杯”一词，而且在向大家敬酒时又对着中国大使说：“为中国，干杯！”此后不久，保《工人事业报》刊载了有关中国征服黄河的短文，并附图片，呈现出少有的示好现象。^③

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公开指责中国党的事件发生在捷克。1961 年 11 月 24 日，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发表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理西罗基在捷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指名攻击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后“更加深了个人崇拜”。尤其在捷共中央致函中国党后，捷“报纸上大量发表文章，指桑骂槐”，反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自翌年 2 月下旬起，捷方也透露出点滴要缓和的迹象。3 月中旬以后，更

①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 年 1 月 19 日；驻波使馆 1960 年工作总结和 1961 年工作规划，1961 年 4 月 14 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 年 2 月 1 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 年 10 月 17 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8-02；109-01526-02；109-02311-01。

②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 年 11 月 25 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8-02。

③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 年 4 月 11 日，外交部档案，109-03276-04。

是明显向中国摆出“一副要缓和的姿态”。捷地方州、县、市在接待来访的中国驻捷大使时，一改前一年冷淡的态度，给予极为殷勤的接待，友好团结成为主要谈论的话题；而庆祝中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的活动，更是呈现出“近两年来未曾有过的”热烈场面。《红色权利报》转而详细摘要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稳扎稳打逐步前进》，并用重体字刊登社论所引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种做法还是“该报近年来的第一次”。^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际共运两条路线的争执中，对华态度也是“松紧起伏，斗争形势波浪式向前发展”。苏共二十二大后，匈牙利的报纸上不断出现影射攻击中国的言论；从1962年3月前后起，匈党的“态度有所收敛”，报刊杂志不再发表意识形态争论的文章，在重大庆祝集会上避免涉及争论问题，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也有所增加。在东德，是年10月中国驻东德使馆举行国庆活动时，东德人员“到得最齐全”，他们的外交官员一般都能与中国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②

根据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分析，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运中的“两面旗帜日益分明，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将更为尖锐”。在公开向中共展开“大规模的面对面斗争的条件尚未成熟之时”，苏联的“主要方针是用两面手法力图限制和孤立”中国，同时为“大反华作积极的准备”。^③与此相一致，中国驻东欧五国大使馆的认识则是，驻在国对华关系松动、缓和局面的出现，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变化”，“做点姿态，骗点资本，以便重整旗鼓，再作较量”。认为冷暖交替、关系改善的原因在于响应苏共对中共“玩弄”的“两面手法”，“是在莫斯科统一指挥下有意安排的”，其“直接目的”是为“配合苏联的政策”而采取的一种“双簧”式的斗争手法。事实上，松动缓和关系的做法是“外松内紧”，并且“只限于上层”，“而对下层还是严加控制”，所谓“上松下稍松，控制力强的多松，控制力弱的少松”，“好转有限度，缓和有保留”。至于友好状态的持续与否，则要根据“莫斯科的指挥棒而定”。^④这种评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对东欧五国牵制、约束的现实，但是，就中苏关系短暂缓和的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05页；外交部致驻捷使馆并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等机构电，1961年11月27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4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5日，外交部档案，109-02989-05；109-03242-01。

② 参见驻匈使馆报告，1962年10月17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0月29日，外交部档案，109-02474-02；109-03821-01。

③ 中国驻苏使馆1961年工作总结和1962年工作计划，1962年2月16日，外交部档案，109-02422-01。

④ 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14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4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0月29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5月3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6月1日；驻匈使馆报告，1962年10月17日，外交部档案，109-03242-01；109-03821-01；109-02338-01；109-02474-02。

结束而言，中国内政外交方针的扭转实际上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中共对苏方针由让步向激烈斗争回归，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了向着分裂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轨道之中。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松、暖”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转为以“紧、冷”为主的基调。

东欧四国兄弟党会议与大论战的肇始

1960年夏开始的中共对苏政策的让步性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经济形势与周边环境恶化而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①中苏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未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到1962年中后期，由于中共中央在总结大跃进等政策失误过程中显露出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倾向突破了毛泽东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国际共运左派队伍形成后中共要做国际共运旗手的心理逐渐膨胀，毛泽东在是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②此后经中苏两党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斗争，中国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近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中苏关系成为一种“统战关系”。^③据此，中共的对苏方针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由此前的注重留有余地，转化为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

① 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② 有关此问题，详见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第51-67页。

③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把中苏两国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是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是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由此提出，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参见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1月7日，广西自治区档案馆，50/3/62；康生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广西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①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②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当中国就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与美国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以及认为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准备通过在外交上、宣传上开展揭露印度的斗争，“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之时，^③赫鲁晓夫实际上也开始部署东欧五国党与其共同对付中共的新一轮攻击，说服捷共如期召开十二大，其他党“也在莫斯科的指示下纷纷要在年底前召开大会”。^④这样，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联络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四个党的代表大会；苏共方面则由苏斯洛夫、库西宁、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团出席。^⑤

在保、匈两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人都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时，影射攻击了中共。在保党大会上，指责阿党的兄弟党，在与会的64国代表中有40国的代表；在匈党大会上，与会60国代表中有30国的代表攻击阿党。卡达尔和库西宁在匈党代会上的报告及致词中多次出现影射中共的话语，还有代表指名攻击中共。由此，中共中央认为，这次匈党代表大会，是在苏共的指挥棒下，有计划地组织了对中国党的围攻，显然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于是决定，“要抓住为首，进行回击”，要“集中讲三点：（1）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在苏共；（2）揭露反华大合唱；（3）抓团结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旗帜”。由于这时苏共代表尚未指名攻击中共，因此中共中央指示说，“我党也不指苏联的名”，而“对于那些仆从国家”则“不予纠缠”。中共中央还肯定中共代表在匈党代会闭幕后的酒会上发表的维护阿劳动党的祝酒讲话，称“这一回击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使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意外的震

① 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

②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③ 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中央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1962年11月14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④ 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1月20日，外交部档案，109-03242-01。此前捷国内曾传言捷共十二大要延期，理由是经济上搞得很糟。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0月24日，外交部档案，109-03242-01。

⑤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

动”。^①

12月3日，捷共十二大开幕前夕，中共代表团赶到布拉格，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已率苏共中央国际部人员先期抵达，捷共党代会会场内外到处是苏共代表团的人在活动。翌日，大会开幕。捷共总书记诺沃提尼在总结报告中猛烈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支持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作为第一个外国党致词的勃列日涅夫紧随其后，也指责阿劳动党和所谓“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他们企图把人类拖入热核战争。对于中共方面来说，这种影射性言论，不啻于一个反华动员令。由此开始，无论是捷共代表发言，还是外国党代表团团长的致词，都纷纷攻击阿劳动党和指责中国党。据中共代表团的统计，与会60多个外国党代表团，其中有50多家指名攻击阿劳动党，并有20家指名攻击中共，其数量和比例超过了保、匈两国的党代会，形成了又一次反对中国党的高潮。东道主捷克党这次站在了反华、反阿的第一线。^②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于12月5日在会上致词进行回应，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在伍发言过程中，会场上出现了嘘声、拍桌、跺地板等现象；其后的发言人也开始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和中共代表团。^③

中共中央接到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后，刘少奇于12月7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一致认为，东欧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反阿反华的情况愈益严重，捷共的大会极不正常，我方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团发表一个特别声明，并指示代表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但要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退出大会，要坚持参加会议到底。同时决定准备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欧洲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共的攻击，并且首先要评论捷共大会。公开评论之前，首先发表他们的重要反华言论。毛泽东同意了常委会的决定。12月8日，诺沃提尼总结发言之前，伍修权向大会主席团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批评大会攻击阿劳动党和中共的做法，以及大会上出现的“喧嚷、嘘叫等不正常的方式”。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指出，意共、捷共两个大会的反华叫嚣，明显是苏共一手组织的，表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进一步采取分裂步骤。看来，在古巴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面貌，他们很不得人心，所以妄想用猖狂的反华来转移视线。这个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道路斗争的新发展。这个斗争，正在继续展开着。^④

① 参见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关于保、匈党代会情况的通报，1962年12月3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②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2-353、356-357页。

③ 《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5日，第1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53-354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2-514页；《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5日，第1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55-356页；中共中

捷共十二大结束不久，12月14日的《人民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诺沃提尼和其他代表在会议上对中共批评和指责的言论。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长篇社论。社论评述说，在国际共运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列主义、反对中国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逆流。社论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在欧洲先后举行了保共八大、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意共十大和捷共十二大，“不幸的是，这些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竟被利用为攻击兄弟党的场所。这一股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逆流，在意共和捷共的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社论特别介绍了捷共代表大会的情况。此社论由毛泽东审阅并改定标题，毛还批示说：“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在中共看来，保、匈、捷三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不啻为一轮“围剿”，中共必须发起“反围剿”斗争。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共与苏共集团公开论战的开始。^①

对于此时的中共来说，那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乃至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迫使中国党搁置争议、淡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已成为过去。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在赫鲁晓夫的指挥下，修正主义者在欧洲四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共的攻击。“从保、匈、捷、意四个党的代表大会情况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通知》号召：“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在全党全军范围内，有领导地、有控制地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②此后至1963年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两篇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拉开了全面论战的架势。^③莫斯科则以1月7日《真理报》近两万字的编辑部文章予以回应，不点名地批评中共把自己置于列宁的地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处方强加给兄弟党，分裂共运。^④

1963年1月15日至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亲率庞大的苏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几条限制发言的新规定，诸如只邀请各党第一书记为代表团团长的来宾在大会上致词、其他各国的党按地区推派代表

央关于我党代表在意共、捷共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的情况的通知，1962年12月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2/1129。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4、15日，第3、4、1版；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5-517页。此篇社论底稿的标题为“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毛将其改为发表时的题目，并批语：“题目似以改一下更为概括些和响亮些，请酌定。”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5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19/240，第4-5页。

③ 《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

④ “苏联真理报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1963年2月21日。

致词等，旨在剥夺许多代表团发言机会的同时，也限制支持中共的朝鲜、印尼等国党发表意见。而东德报纸则在发表各兄弟党的书面致词时，限制刊登支持中共意见的致词。如此种种措施，使大会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气氛之中。东德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 15 日大会开幕时的报告中，率先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中共发起攻击，指责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原则，必将导致战争。^①

面对中国党亮出的“反围剿”、进行论战的姿态，赫鲁晓夫转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在 16 日大会上的致词中并未直接提及中国，只说：“现在停止各共产党之间的论战，停止在自己党内对其他党进行批评”，“是有益的”。^②赫鲁晓夫讲话之后，东德党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约见中共代表团，表示东德党支持苏共的“正确建议”，要求中共予以响应。与此同时，苏共代表团同东欧、西欧一些国家的兄弟党在会场内外活动，宣传赫鲁晓夫的讲话是“温和的、和解的”，说现在不应该追究谁先开始攻击，“而是如何停止争论的问题”，“一切都清楚了，就要听中国代表的讲话了”。对此，1 月 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了讨论，并为中共代表团拟定了新的给德党六大的祝辞。新祝辞强调对“和解”建议要听其言观其行，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次日上午，伍修权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并宣读贺电时，大会执行主席一再摇铃制止伍继续发言，主席台上、会场中则是吹口哨、跺地板，一片喧闹之声。^③

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汇报，认为德党代表大会是修正主义者反阿反华的新高峰，赫鲁晓夫亲自出席指挥，而且还假惺惺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因此很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社论，一方面高举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对赫鲁晓夫的诡计加以揭露，只是还不公开点赫鲁晓夫本人的名。这样，德党六大闭幕一周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为名，揭露赫鲁晓夫的真面目。^④

2 月 21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其后，3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⑤但是，此时的中共已正式提出“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359-360 页；“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致词的摘录”，《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26 日。

② “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22 日。

③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360-362 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523 页；《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27 日。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250 页；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462-463 页。

题”^①，认为国际共运领袖的责任已落到中国党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②因此，中国党已不能再完全认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是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③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④，正式迈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

可以说，赫鲁晓夫为报复中共对其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攻击，试图借保、匈、捷、德四国党及意共（十二大，1962年12月2—8日）召开代表大会之机，由兄弟党领导人打头阵，影射攻击中国党。会上发生所谓“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进一步激起了中共要与苏共公开进行全面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雄心。不过，在这五国党代表大会上，尽管有42个党公开指责中国党，但与1960年莫斯科会议相比，数目还是少了，而兄弟党中的左派敢于公开出来说话维护阿劳动党和中共的却多了。^⑤这种情况无疑又增强了中共把论战进行到底的信心。由此，东欧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上不仅为中共进行大论战提供了演练的舞台，而且还为这场大论战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契机。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向我党进行的公开攻击，丝毫不能损害我们，相反地，使我们取得了公开回击和批评他们的权利。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争论，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必须严肃对待”。^⑥

此后，波、匈、东德、捷、保东欧五国党成为苏共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论战的主要依靠力量。^⑦根据中国驻这五国大使馆的分析，或说“德党态度之恶劣较东欧各国更甚”，他们放肆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恶化中德两党两国关

①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这里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等国际斗争中，“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

② 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

③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④ 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页。

⑤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分析了这次欧洲兄弟党会议形成的所谓新的反华浪潮的特点。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32-533页。

⑥ 中央关于正确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通知，1963年1月6日，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

⑦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系；或认为“捷现修领导集团，紧跟着指挥棒”，“用敌性宣传方式，竭力想把我与最反动势力放在一起”，“在新的斗争阶段中，成了反华大合唱丑角中的绝对冠军”，“其特点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继续恶化两国关系”；或通报说保共斥责中国党诬蔑诋毁苏共和苏联，“只能得到马列主义背弃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叛徒的耻辱称号”，鼓动大反华；或介绍匈牙利党报“故意歪曲”中国代表在世界妇女大会上的发言，指责中国好战，“煽动人民反华”；或报告波兰报刊就中国国庆发表社论并攻击中共，波对华关系更为冷淡。^①总之，随着党际争论的尖锐化，中国与这五国的关系也开始全面恶化。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3月会议以及援越问题发生了新的冲突。斗争的中心，前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后者则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过境中国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在这两方面的斗争中，东欧五国密切配合苏联反对中国：一是与中共继续论战，指责“中国分裂”，“不参加三月会议”，“反对通过国际会议商定反帝斗争共同策略并加以贯彻的必要性”；保共甚至在转载兄弟党反华文章时使用了“世界霸权政策”等标题。根据苏共提供的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受阻等信息，五国党同时统一口径指责“中国只是口头上支持越南，毛泽东声称只有战争打到中国边界中国才会参战”，而“越打落的美国飞机都是苏帮助的结果”。波党领导人则认为，“越南问题是由于共运分歧敌人才敢侵略的，如共运团结，肯定不会发生越南战争”，进而抢先配合苏联发表反华文章，在人民群众援越反美情绪高涨之际，就中国反对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联合行动”，攻击中国党，并封锁报道中国支持、援助越南的言论和行动。^②东欧五国与苏联协同动作，一时间似乎在重演与苏共“对对表”的局面。

1966年中国正式启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全国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中苏边

① 驻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7月20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7月24日，1963年8月20日，1963年9月9日；各国共产党动向，1963年8月6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7月7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0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2574-02；109-03391-03；109-02631-01；109-02666-01；109-02742-01。

② 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5年4月1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5月29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5年12月24日，1965年3月15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65年10月18日；驻波使馆一九六五年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0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4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2938-02；109-02910-01；109-02938-02；109-02910-01；109-03669-04；109-02910-01。关于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斗争，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26-191页。

界冲突随之逐步升级，到1969年还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边境局势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过程，进入敌对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其中中保、中捷关系尤为紧张。这一时期，中国进一步认为五国已经变为“修正主义集团”，中共与捷、匈、保、德四国党的关系相继断绝，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关系虽未正式终止，但中波两党的对立情绪同样愈益加剧；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国家关系也呈低迷状态，除贸易关系外，其他各领域的合作陆续中断，相互间抗议交涉频繁，社会主义阵营已是名存实亡。^①

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

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是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的。就中国的对苏方针而言，1960年初以后，中苏两党虽然经历了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上的斗争，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双方都不愿意矛盾激化，都强调要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毛泽东此时仍然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定性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赫鲁晓夫还是半修正主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苏共尚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会雨过天晴。^②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③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批示，中共中央还确定了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方式，即“要讲究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多数，孤立修正主义”。^④如前所述，自1960年中期到1962年中后期，中共的对苏方针有一个从以让步为主到以斗争为主的调整，中苏关系也由缓和、僵持转入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开始后的紧张状态。1964年初，随着大论战的升级，^⑤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两国关系恶化，毛泽东在是年中期对国家军事

① 关于1965-1969年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详细状况，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5-322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安徽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1960年9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1-29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4-345、342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页。

④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安徽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1960年9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92-293页。

⑤ 1964年1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57、660页）。这样，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3篇长文，即“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

防御战略作出调整，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同时酝酿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大革命。苏联由友变敌角色的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①与此相应，中国在处理与东欧五国关系问题上，大方针随着中国对苏方针的调整而调整，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与此相应，中国在处理与东欧五国关系问题上，大方针随着中国对苏方针的调整而调整，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一）关系回暖时期中国对东欧五国的基本方针及其变化情况

196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东欧五国关系的基本方针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同时还要区别对待”。^②这一方针在中国与东欧关系回暖时期，基本上得到了正常的贯彻。

例如，1959年末1960年初，中共中央在确定继续把中苏团结作为基本政策的同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赫鲁晓夫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中共应该帮助他，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的思路，^③利用4月22日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的机会，相继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④集中宣传中共的理论观点，以拖住赫鲁晓夫，延缓其向修正主义滑落的步伐。^⑤这三篇文章被汇编成单行本，以《列宁主义万岁》为书名出版。^⑥此后，还有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等多种反映中苏分歧、强调中共

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人民日报》，1964年2月4日、3月31日、7月14日）。

①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详见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

② 驻波使馆党委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8月16日，外交部档案，109-02305-01；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6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8-01。鉴于“区别对待”方针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文将另节考察。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1、233页；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24-126页；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月17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

④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4月22日，4月23日。

⑤ 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⑥ 人民出版社编：《列宁主义万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些文章很快“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并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3351页。

立场观点的单行文件印发。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这些出版物和印行材料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中共方面向兄弟党散发的主要宣传品。

对于中国驻外使领馆在驻在国大力散发宣传材料的做法，东欧五国都表达了反感情绪。有的是由国家领导人直接提出责备，如哥穆尔卡指责中国驻波使馆散发宣传材料，特别对中国使馆印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满。^①有的是由主管官员发表意见，如保加利亚外交部新闻司长约见中国驻保使馆官员，要求该馆停止散发印有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的使馆公报，认为这是不尊重中保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在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②而匈牙利副外长则与中国大使会见，就该馆第17期公报中发表涉及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蒋南翔和吴玉章的讲话、中共致阿劳动党贺电等问题进行交涉，希望删除这些材料。^③一时间，围绕对外散发宣传材料事，中国大使馆与驻在国摩擦不断。

在此期间，中国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采取了与驻在国配合的态度，要求使馆在驻在国印发小册子，“要贯彻‘求同存异’的精神”，“不要给对方以我挑起争论的口实，以适应和巩固莫斯科会议后兄弟党团结一致的新局面”；并指示，要在陈述散发小册子、使馆公报等属于使馆的正常业务、符合外交惯例的同时，决定停止或不发小册子等单行文件。关于涉及争论问题的使馆公报事，中国外交部一方面电令驻保使馆：国内报刊评论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争论的文件，如无国内特别指示，不必刊印；一方面指示驻匈使馆：第17期公报停发，抽出引起争议的讲话、贺电等，改为第18期，以脱期表示抗议。^④

当然，中国围绕对外散发宣传材料作出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并不意味着中共与东欧五国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消弭，只是表明中国方面为配合此时对苏关系和解的趋势，对东欧五国关系的基本方针也转向“注意谨慎、克制地解决矛盾，留有余地”。事实上，对于以正统马列主义代表自居的中国党来说，在宣传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方面屈从于外部的限制，不与之争执、辨明是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要做秋后算账的准备的。即如伍修权在哥穆尔卡批评中国驻波使馆散发宣传材料一事上所发表的意见那样：“现在不要谈，可记下一笔账，将来

① 外交部请示函，1961年3月17日；驻波使馆1960年工作总结和1961年工作规划，1961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3769-01；109-01526-02。

② 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11月2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5-01。

③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年12月15日，外交部档案，109-02328-01。

④ 参见驻波使馆1960年工作总结和1961年工作规划，1961年4月14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11月2日；外交部致驻保使馆电，1961年11月14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年12月9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年12月15日，外交部档案，109-01526-02；109-02335-01；109-02328-01。

需要时再用。”面对捷总理西罗基发表指责中共搞个人迷信的讲话一事，外交部的指示也是：“把帐挂起，不要多同他们纠缠。”同时采取党和政府不出面，而让群众表示愤慨的方法，致使捷方十分狼狈，认为中国运用了“异乎寻常的手段”。^①

1962年以后，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随中苏关系的变化，进入到表面上继续缓和友好，实际却或松或紧的僵持状态。在反修斗争形势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中共对东欧五国的基本方针有了微妙的调整，即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对于驻在国一切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强调“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对驻在国做工作方面，强调“积极主动地多做工作”，“扩大我党的影响”，“适当扩大接触面，不要局限于少数同我很友好的人”，以便“扩大眼界，便于对照比较，得出更全面的看法”。并且增添了新的内容：一是“过去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交朋友”，现在“在兄弟国家也应该允许交朋友，并把交朋友看成是正常的活动。为了不被人抓把柄，可以好坏都交，以坏的掩护好的”。二是通过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揭露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列主义的真实面目”，“增加对驻在国领导集团的压力”，“争取团结对敌”；面对东欧五国跟随苏联步伐而出现的缓和对华关系的现象，要“本着弄假成真、因势利导、争取主动、恰如其分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②

（二）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时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调整

1962年末，毛泽东指示：“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据此，中国开始“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提出在国际活动中“要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③于是，到1964年中后期，中国与苏联和东欧五国的关系转入意识形态论战的轨道。此后一直到1960年代末，中国对东欧五国的方针不断发生变化，逐渐推进了分化瓦解苏东集团、以及联合东欧五国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构想。

随着中国对苏方针的调整，中国对东欧五国的方针也从“以斗争求团结”转向如遇影射、挑衅，“应坚决斗争，当场痛斥，不怕紧张”；“既要抓团结的旗帜”，又

^① 外交部请示函，1961年3月17日；外交部致驻捷使馆并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等机构电，1961年11月27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4日，外交部档案，109-03769-01；109-02989-05；109-03242-01。

^② 驻保使馆1962年工作计划要点，1962年2月1日；外交部批复驻波兰使馆函，1962年4月21日；朱其文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25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32821-04；109-02305-02；109-02395-01；109-03242-01。

^③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要“仍采取冷的态度”，对于驻在国“装出”的友好姿态，“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而对驻在国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应“冷淡表示报外交部研究”，“不要承担任何义务”。^①由此，中国驻外机构开始积极投身大论战的行列，广泛散发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复信，递送的对象不仅为“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文化科学机构、社会团体、个人等”，而且还包括驻在国被开除党籍的人；不仅“通过邮寄和亲送到手的方式散发”译成驻在国文字的《建议》，而且还从北京向驻在国研究所、机关、团体和个别人士寄送俄文和英文的宣传材料，甚至从美国向东欧一些国家的个人和机构邮寄中共的论战文章。^②

此时，中国把对东欧五国方针的重点放在了对驻在国展开工作的问题上，强调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反修同做友好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在“做好上层工作”的同时，开始格外注重做“中下层人士的工作”，利用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机会，积极主动地接触中下层，以期逐步扩大中国的影响，突破“修正主义集团”的“限制、冷落”和“封锁”。^③赫鲁晓夫下台后，这种工作方针进一步转化为做东欧各国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根据驻在国民众思想波动，所谓“左派信心更足”，“中间的更动摇”，“右派则更心虚”的情况，突出注意抓各种机会，同各方人士多做接触，多做工作。^④1965年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之后，与苏共采取的呼吁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即所谓“笼络右派、分化左派、孤立中国”的方针针锋相对的是，中国更加强调“要讲究实效，抓紧战机”，“同帝、修、反争夺宣传上的主动权”，并且“要敢于宣传”，“着眼在争取大多数”。^⑤

早在与东欧五国关系短暂缓和时期，中国就已在评估驻在国所谓“健康力量”的发展前途，以及由这种“内部健康力量”替换现领导的可能性的问题。^⑥在中苏分裂之后，培育驻在国亲华势力，以及分化东欧五国与苏联的关系，更成为中国对五国方针中的重要内容。至于鼓励并支持兄弟党中左派分子另组派别或另行建党，壮大国际共运左派队伍，则是在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国际共运发生分裂迹象时即开

①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电，1963年4月27日，外交部档案，109-02574-02。

② 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8月4日；各国共产党动向，1963年8月6日，外交部档案，109-02625-02；109-02631-01。

③ 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10月5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10月6日，外交部档案，109-03391-03；117-01365-04。

④ 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4年12月03日，外交部档案，109-02736-03。

⑤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10月3日；驻波使馆一九六五年宣传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109-02910-01；109-03669-04。

⑥ 朱其文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25日，外交部档案，109-02395-01。

始了。^①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支持东欧五国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组织，促进五国对苏联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也开始成为分化瓦解东欧集团、孤立苏联的手段之一。

1966年5月初，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谢胡、卡博等人就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交换意见。当谢胡谈到德、保、波、捷各党完全是苏联的仆从时，毛泽东表示：“不一定意见完全一致吧！”他们是“一个控制，一个反控制。”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卡博向邓小平等人介绍说：在东欧这些党内，特别是像波兰、保加利亚，他们有左派。保加利亚有很多很好的共产党人，就是没有组织起来。不久前波兰就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一个地下党。该党临时中央负责人（杨力），过去是波党中央委员，贝鲁特的助手，曾经任交通部长。他是秘密出去的，进行地下活动。当卡博转达杨力的愿望，说他表示希望同中国党保持联系时，毛当即明确答复说：“好，应该联系。”并嘱咐说：“他们要更谨慎。”^②

是年末，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随同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康生一起乘专机抵达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专门接见了杨力。毛鼓励说：“希望在你们，在少数而不在多数。希望在你们造反派。”杨力回应道：“我们的造反是正确的，是符合革命方向的。”毛即加以肯定说：“不错，讲得对！说有希望，就是因为正确。一大群挂着马列主义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在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毛关心地询问杨力的行程。康生报告：“次日将离开北京去武汉、广州，然后由湛江乘船去阿尔巴尼亚。”杨力表示：“感谢中国党，使我有机会来到中国，向中国同志介绍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情况，听取了中国同志的看法和中国同志对国内情况和其他党情况的介绍”。“我离开中国时，反帝反修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对我是最大的帮助。”毛则指导说：“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在世界也看到

① 根据苏共领导人的判断，“中共领导人从1958年开始就一步一步加深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对此，乌拉圭共产党中央书记、巴拿马人民党书记，以及阿根廷共产党中央书记都曾向苏共中央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北京还一直在为大部分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员办学习班，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路线，努力孤立苏共（参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350-3352页）。”1961年至1965年，毛泽东也是频繁接见亚非拉美地区的左派共产党人。

②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这里及下文提到的杨力，波兰名为Kazimierz Mijal。前不久，笔者与沈志华赴德国参加一个讨论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会议。会上，我们的朋友、波兰学者郭什卡也谈到这个人。她向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Kazimierz Mijal领导一个获中国支持的非法的波兰共产党，其与中国人联系密切，经常作为“波兰党第一书记”应邀访华。见Malgorzata K. Gnoinska, Poland'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Light of Sino-Soviet Interactions, 1949-1989, for FRIAS conference “Interkit: An International against China?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Soviet Bloc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old War”, May 12-13, 2011。

了希望。波兰、苏联、美国、日本、印尼、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都有希望。革命要靠群众，靠多数；少数人是靠不住的。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人进行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杨力进一步表示：“离开中国时我更坚信，团结在中国周围进行革命斗争，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接见结束时，毛亲自将杨力送到门外，并请他向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其他领导人转致问候。^①

其后，毛泽东继续关注东欧国家的情况。1967年12月末，他在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时，特意陪同同接见的康生、周恩来等人讨论了东欧五国与苏联领导人的互访动态，以及西德问题、罗马尼亚政府改组及罗苏关系，周谈及苏东集团现在“困难重重”。^②

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人民日报》于2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③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接见阿国防部长巴卢库，谈到苏联的入侵时说：铁托也很紧张。南斯拉夫成了我们间接的同盟军。它与苏联有矛盾，要利用他们的矛盾，包括罗马尼亚、杜布切克。对东欧国家要一分为二。苏联武装占领捷克，匈、捷、波、东德等国好多人是不满的，是不赞成的。^④以此向阿方表示了联合东欧其他国家，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意图。周恩来稍后向阿方提出了建立对抗苏联的有中国参加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巴尔干联盟的建议，遭到霍查的拒绝。^⑤时隔数月，在毛泽东会见澳共（马列）希尔时，康生又谈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党和小组的情况，如苏联的斯大林小组，捷克、波兰一些新的马列主义小组等。^⑥

根据目前中国的资料，在整个1960年代，毛泽东从未与东欧五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谋面，唯一受到接见的杨力，还是移居阿尔巴尼亚的地下党负责人。中国联合东

① 毛主席接见波共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② 毛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

③ 《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1968年6月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雄等人时即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见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orking Paper*, No. 22, p. 138.

④ 毛主席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⑤ 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阳果、云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71-272、281-282、304页。该书对此事的记述有矛盾：一处说1966年5月谢胡、巴卢库访华时，中国即对他们提出此项计划；6月周恩来访阿时又向霍查解释这一建议；1968年10月毛、周再次对巴卢库重申此设想（第271-272、281-282页）。另一处则说1968年10月巴卢库首次向霍查报告中国的这个计划（第304页）。根据现有材料以及1966年中南关系的状况，笔者暂时采用后一说。

⑥ 毛主席会见澳共（马列）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欧五国对付苏联的设想未能实现，中国在苏侵捷问题上强硬攻击苏联，声援捷克斯洛伐克的举措也没有得到捷方的呼应。到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时，捷还同匈牙利一起严词谴责中国，说中国在边界上进行“挑衅”。在此期间，中国与东欧五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执和冲突，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如中国使馆宣传窗展出有关1967年莫斯科红场事件的照片受到指责，捷限制中国使馆人员活动范围及关闭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波兰远洋货轮船员途经上海时，代存英国人拍摄中国军事设施的相机等，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气氛随之加剧。^①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试图将分化的触角伸向东欧五国党内部所作的努力，一方面又反映了作为苏联倚重力量的东欧五国集团虽然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但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其离心力尚不强大。而中国试图扶植东欧五国反执政党势力的做法，不仅无法达到瓦解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还构成了促进东欧五国强化对华敌对情绪的动因。

（三）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中的“区别对待”方针

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采取“区别对待”方针，试图分化苏东集团的做法，突出反映在中国与波兰的关系问题上。

可以说，中波关系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1956年波兰十月危机时，中国党曾帮助哥穆尔卡抗衡赫鲁晓夫的老子党、大国主义的倾向。由此，中国在波兰的影响也在这一年达到高峰。^②鉴于波兰想要维护一定的独立性，以及哥穆尔卡办事“不走极端，主张留有余地”的特点，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认为：“如果说英国是西方国家的中间地带，那么波兰可能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它究竟跟谁走，还难作定论。”^③这种意见，为中共中央确定处理与波兰关系的方针提供了参考，使得中波关系较中国与东欧其他四国的关系更近一些，中国对波兰的方针也始终注意留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对波的方针，随着波兰在国际反修斗争中的表现而起伏波动，双方互为因应。波兰虽然在总的方面依靠苏联，对华却并不愿把文章做死。即便因中国在1961年削减对波贸易70%，国内经济受到极大影响，他们也“并未像捷克那样说中国的坏话”。当中国北调船只经台湾海峡，向苏联方面寻求帮助，借用苏联船只和船员遭到拒绝时，中国大使给波兰相关人员打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表现得很“够朋友”。于是投桃报李，尽管中国方面认为“波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思想比苏联有过之、无不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9-320页。

② 详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Zhihua Shen/Yafeng Xia, “New Evidence for China’s Role in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October 1956: A Not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XXXI, No. 3 (September 2009), pp. 558-575.

③ 王炳南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31日，外交部档案，109-02392-01。

及”，有时“哥穆尔卡的口里只有苏联，没有中国”，中国方面仍然认为“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总是少数，打击面不要搞得过宽”。^①

在中国外交部看来，1962年底哥穆尔卡与赫鲁晓夫两度会谈以后，波方反华言论更为突出，成为德党六大后东欧国家发表影射和攻击中国文章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一般情况下，波兰不愿走在反华第一线，斗争比较谨慎，留有余地，对维持国家关系比较注意，对中国进行挑衅的事件也比较少，在两国贸易谈判中能够谅解中方的困难等，与此相应，中国“也注意区别对待，给波适当照顾”。^②

中苏两党大论战开始后，中国外交部认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矛盾正在发展，由此决定“对波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可多做些工作，但也不宜表现过热，操之过急。在经济方面，可给波一些甜头。初步考虑，明年对波贸易总额比今年将有较大的增长”，“贸易总额争取超过3000万卢布”，“出口方面也可增供一些波兰需要的商品”，“还可根据情况的发展，做一些补充贸易”。外交部还指示王炳南，“另找时间利用适当时机同波方一位领导人作一次交谈”，向其表示：“我们注意到波兰在同中国的国家关系方面，有着自己的做法，这是同有些国家有区别的”；“我们愿看到中波两国关系不断发展”。^③

1964年初，毛泽东提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这一方针虽然主旨在于部署大论战的文章将矛头直指赫鲁晓夫，进行点名批判，打到其痛处，而不再围绕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政策等问题做文章，但对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年初，为了阻止西德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直接掌握核武器，波兰提出了冻结中欧核武器的建议。对此，中国方面认为，该项提案“是建立在修正主义和平共处总路线基础上的消极建议”，“美苏可能利用此项建议，要求援例在其他地区冻结现状”，束缚中国，以维持美苏的核垄断。因此，中国外交部特通告各驻外机构，“对于波兰的建议，我们不宜支持”。同时又指示说，由于该提议有可能是为牵制苏联在西德核武装问题上作更大让步，以及鉴于波一向注意同中国保持友好的国家关系，因此，“对波方建议也不宜进行揭露和批评”。^④

毛泽东本人也对波兰的动向格外关注。是年5月，他在接见秘鲁、厄瓜多尔两

① 参见王炳南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31日（此件中“削减对波贸易70%”文字的上面，有手写“50%”的字样）；驻波使馆1960年工作总结和1961年工作规划，1961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2392-01；109-01526-02。

② 中波两国政治关系简况，1963年1月31日，外交部档案，109-02609-01。

③ 外交部复驻波使馆电，1963年11月20日，外交部档案，109-03928-01。

④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代办处，广东、河北、山东、辽宁、上海各省市市委并转外事办电，1964年3月28日，外交部档案，109-03930-01。

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特别谈到波兰对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不积极”，从1963年夏季前到1964年夏季前有这个变化，询问对方感觉到这一点没有？毛指出，“修正主义内部有危机，如赫鲁晓夫要开会，要开集体制裁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会议，也许开得成，也许开不成”。^①其后不久，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出现“大肆反华”的情况，外交部仍然考虑：尽管如此，“但我已决定不扩大打击面，不作评论，特别在国家关系上，仍要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由此建议与波方相应部门有关系的单位，对当年的波兰国庆节依旧按惯例、按礼节致贺；同时复电中国驻波使馆，表示同意该馆关于加强对波工作的意见，还特别强调“对波的工作还可多做一些”。^②

当克里姆林宫发生政权更迭后，中国有关部门在了解到“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同苏联新领导最亲近”的情况下，依然请示派遣政府代表团参观第三十四届波兹南国际博览会，并提议代表团的“规格可比往年高一些”，以利“对波兰做些工作，利用波苏矛盾，扩大我在波兰的影响”，获周恩来批示同意。面对波兹南博览会期间波方接待规格高于往常，对中国代表团态度的特点是“谈友好、合作，不谈分歧；谈经济贸易，不谈政治”的状况，代表团根据国内指示的精神，以“给以希望，但不承担具体义务”；“反复表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是我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我们愿意看到中波两国关系进一步搞好”作为对应之策，但建议在有利于分化波苏关系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对波贸易，加强与波兰的科技合作和文化往来，加强对波兰的宣传工作。而此时中国与东欧五国中其他四国的关系则相对较差，其中中保、中捷关系更为紧张。最后，中国与其他四国终止了党的关系，而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关系却没有正式断绝。^③

尽管如此，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并未取得成功。中共一方面暗中扶植从波兰党分裂出来的“健康力量”，一方面又公开支持波兰与苏联闹独立，在分化苏东集团的同一目标下所采取的这两种方针是矛盾和冲突的。注重前者，势必引起驻在国的反感和防范，使“区别对待”方针流于形式。而追求后者，则又会影响毛泽东另起炉灶，重新组织世界革命力量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

① 毛泽东接见秘共、厄共两个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5月25日。

② 外交部关于按惯例祝贺波国庆节的请示，1964年7月4日；外交部、对外文委复驻波使馆电，1964年9月9日，外交部档案，109-02742-02；109-03559-01。

③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2月7日；外交部请示函，1965年5月24日；我参加波兹南博览会政府代表团访波情况的报告，1965年7月5日；驻波使馆一九六五年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109-02747-01；109-02907-01；109-03669-0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5-316页。

总体来讲，中国在 1960 年代对苏东集团的外交方针是失败的。从目前中国方面披露的档案文献来看，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Abstract】 In 1960s, Sino-Soviet relations were in splitt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Bulgaria、Czech、East Germany、Hungary、Poland, the five countries of Soviet-Eastern Europe Bloc, restrained by the evolu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luctuated with changes of the country and par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In the beginning of 1960s, as the detent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or a time,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instability yet striving for detente. In the end of 1962 and beginning of 1963, centered on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China-India boundary clash issues, new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were in incub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justed policies towards Soviet Union to struggle and attack as keynote, ready to debate with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hile,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deployed that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riticiz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ongress of part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ur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ereon, the public debate on ideology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ere initiated. At the launching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in-Soviet boundary clash was accelerated to local war,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were in hostile status, and the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exacerbated. In 1960s, changes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in general synchronized with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yet with diverse contents and features, presenting with different changes in accordance with evolution of period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adopted by China, with aim to divide Soviet-Eastern Europe Bloc, wa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Sino-Poland relations. In general,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1960s was changing and conflicting, which, to some extent, only resulted in strengthening cohesive power among the Soviet-Eastern Europe Bloc, rather than obtaining the aim of dividing the Bloc.

【Key Words】 China-Soviet split, the Chinese politics towards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5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1960-е гг.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эпохе

раскол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НР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Болгария, Чехия, Восточная Германия, Венгрия, Польша) менялис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эволюции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колебались по мере изменений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партиями двух стран. В начале 1960-х гг. ,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время смягчалис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НР и пятью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улучшались и смягчались. В конце 1962 - начале 1963 г, КНР и СССР начали новую борьбу вокруг проблем кубин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китайско-индийского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КПК изменила политику к СССР наступлением и борьбой, собралась вести полемику с КПСС; КПСС подала мысль пят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критиковать КПК на партийных съездах четырех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Началась открытая полемика по идеологии между КНР и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ой. С началом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НР,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лся в локальную войну.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пали 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НР и пятью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сильно ухудшились. В 1960-е гг. измен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к пят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во многом были схожим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к СССР, а в разных эпохах были разными в содержании и чертах. С целью разде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КНР принял курс «относиться по-разному». Такой курс отражал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целом, кита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 пят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непрерывно изменялся, даже вступал 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с самим собой.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НР не достигла цели разде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наоборот,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укрепила сцеплени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раскол,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